

專題分析

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 趨勢與展望

張登及

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助理教授

摘要

美「中」兩國是全球第一與第二大經濟體，也是最大的軍事支出國。兩國的雙邊關係在美國總統歐巴馬上任之初維持平穩，但歐巴馬執政 1 年多以後，華府用「重返亞洲」調整戰略重心，開始對中共反守為攻，相當程度符合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的預期。而中共雖然硬實力增強，但面對美國的攻勢，近 2 年在外交領域出現不少挫折。本文以「位置」與「身分」兩個概念為軸心，對「中」美關係近年來的發展做出分析，認為歐巴馬政府執政初期對中共的「戰略再保證」，是為了爭取戰略修整時間，立足地緣圍堵的攻勢戰略正在取代「避險」，以削弱中共位置持續強化的趨勢，逼迫中共無法在「挑戰者」與「負責者」「身分」之間取巧。而中共受「身分」與「位置」逆行問題困擾由來已久，只是美國以往身陷伊阿戰爭，中共外交戰略的缺損不容易暴露。所以中共「位置」上升雖是不爭事實，但回應美國攻勢的關鍵倒不是如何繼續改善「位置」，難產中的「身分」創新才是重點。

關鍵字：重返東亞、中美關係、中共外交、攻勢現實主義

壹、前言

「中」美建設新型合作夥伴關係是一項具有重要和深遠意義的開創性工作，既沒有先例可循，也沒有經驗可鑒，只能「摸著石頭過河」，或者「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 習近平(2012)：華府歡迎午宴致詞¹

We have an enormous stake in each other's success - we will be more prosperous and more secure when we work together.

～Barrack Obama (2011)²

So I don't think there is any doubt, if there were when this administration began, that the United States is back in Asia. But I want to underscore that we are back to stay.

～Hillary R. Clinton (2011)³

美「中」兩國原本即是亞太地區的主要大國，在國際體系佔據重要地位。由於中共取得政權後一度倒向蘇聯，使兩國關係高度緊張。1970年代以後，雙方又因體系性的因素而合作制衡蘇聯，加上後來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需要美歐挹注資金，關係始逐漸緊密。但由於當時兩國國力差距頗大，中共固然重視「聯美」，美國對「中」政策則一定程度附屬於「兩極」的制蘇戰略。蘇聯瓦解後，美國的獨強地位一度無與倫比，中共重視美「中」關係仍大過美國重視美「中」關係。但此一後冷戰趨勢不過維繫數年，即在 1996 年臺海危機開始改觀。只是由於「文明衝突」與「反恐戰爭」，美國在新世紀之初戰略焦點偏移了 10 年，同

¹ 習近平於 2012 年 2 月訪美歡迎午宴之致詞。參閱文匯報(香港)，2012 年 2 月 16 日；<http://sh.wenweipo.com/?viewnews-3547>，檢索日期 2012 年 3 月 16 日。

² 美國總統歐巴馬於 2011 年 1 月胡錦濤訪美時的致詞。參閱 2011 年 1 月 19 日 BBC 報導，“China's Hu Jintao and Barack Obama Pledge Stronger Ties”，<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2223965>。檢索日期 2011 年 1 月 20 日。

³ 美國國務卿希拉蕊於 2011 年 11 月發表之談話。參閱《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2011 年 11 月 14 日，<http://www.theaustralian.com.au>。檢索日期 2011 年 11 月 27 日。

時也期待中共政經分離的模式是否失敗。但到了歐巴馬(Barack Obama)總統上任，美國影響力已遭伊阿戰爭和金融危機連續挫折，中共經濟增長、軍事現代化和外交軟權力則仍持續上升。目前來看，美「中」關係已是雙方對外戰略中最主要的雙邊關係，甚至不可諱言是未來體系中最重要、最關鍵的雙邊關係。可以說，當前美「中」關係已經是兩國外交的「重中之重」。

美國因此用「重返亞洲」調整戰略重心，對中共反守為攻，相當程度符合「攻勢現實主義」的預期。而中共雖然硬實力增強，但面對美國的攻勢，近 2 年在外交領域出現不少挫折。究竟中共整體外交佈局和對美戰略，是否能延續過去 30 年基本穩定且時有斬獲，即便有危機亦能轉危為安的成果？美「中」關係與當年美蘇關係的差異究竟是本質的不同，還是大異其趣，只能「逢山開路，遇水搭橋」？中共對美戰略將如何調整，以維護其持續發展、邁向小康的總體戰略目標？本文以下的分析，即嘗試藉助「位置」與「身分」的分析框架，初步回答這些問題。

貳、分析框架：「位置」與「身分」

本文認為，分析中共對美戰略及外交政策，必需將美「中」關係放在中共全般外交戰略來觀察；美國對華戰略亦是如此。胡錦濤在中共 2009 年第 11 次使節會議提出所謂「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⁴，這四條線也是北大學者王逸舟所謂的「平行四邊形合力」的一部分。中共外交在其中，並不一定拘泥於單一「身分」與「位置」。⁵而某一外交場域的「身分」與「位置」，又是承襲自前一階段的遺緒和格局，且彼此相互牽動。因此，本文採用了筆者過去結合歷史研究與理論得出的「中國外交類型學分析」的模

⁴ 資料指出，此四點首次出現於 2004 年胡錦濤主持的第 10 次使節會議。當時的順序是「周邊是首要、大國是關鍵、發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此會議約 5 年舉行一次，是中共最高領導層提出外交戰略的重要場合，按例所有在京局常委都會出席。薩仁，〈中國外交出現微妙調整〉，《紫荊雜誌》，2009 年 9 月，<http://www.baumag.com.hk/big5/channel3/0909/0935.html>。檢索日期 2012 年 3 月 15 日。

⁵ 王逸舟，《中國外交新高地》（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 年），頁 39-40。

型。⁶這一類型學分析同時結合了社會學建構主義所重視的主觀意義賦予行動者的「身分」(identities)，以及結構現實主義所重視的「體系位置」(positions in the system)。而互為主觀的「身分」與相對客觀的「位置」，共同制約了一國的外交政策趨向。這項設計在中共外交研究中並非首創。資深美國學者范乃思(Peter van Ness)是以「身分」研究中國外交的先行者。⁷知名中共外交研究者江憶恩(Iain Johnston)等近期也曾對中國大陸參與國際事務後「身分」認同的變化與影響有嶄新的分析。⁸

簡言之，一國對外戰略與外交政策是由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位置」與國際社會中的「身分」共同決定的。首先，「位置」是由行動者在體系中，根據權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的格局及自身的「能力」(capabilities)所規定的。例如在「兩極」體系中居於一極，或者在單極體系中居於霸主等等。其次，如米爾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的「攻勢現實主義」所言，「位置」也取決於「地緣因素」，比如兩國的臨接程度(proximity)。國際政治的行動者(無論是個人或是其他單位)被假定具有能動性(agency)，意思是指能夠做出選擇。但「位置」則限制了行動者的選項，使其無法有無限多的政策可能。此外，行動者被假定至少會防禦性地保衛現有的「位置」不使惡化。「位置」的保衛行為戰略上體現了傳統的安全觀。⁹

「身分」則在有限的政策選項中，依據行動者既往累積的歷史經驗與價值認知，合理化了特定的選擇，使其更易於出線。「身分」也可以包括兩個共構(mutually constructed)方面。首先，「身分」的屬性是心理學上的「歸屬感」，即個體主觀認定「我是誰」的問題。在這方

⁶ 張登及，《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臺北：揚智出版，2003年)。

⁷ Peter Van Ness, "China as a Third World State: Foreign Policy and Official National Identity," in Lowell Dittmer, and Samuel S. Kim ed., *China's Quest for National Identit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 194-214.

⁸ Iain Johnston, *Social States: China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1980-200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⁹ 結構現實主義又分為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就是位置的保衛者。M. J. Grieco, *Cooperation among Nations: Europe, America, and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0).

面，「身分」也常被稱為「認同」(identity)。其次，「身分」的另一屬性是行動者與他者(others)互為主觀的互動產物。易言之，其屬性是社會學的「資格」(membership)，需要在一個「社會的」(social)情境中得到他者的正面或負面回應，使這個「資格」的內容得到證實。心理層面的歸屬感與社會層面的資格，可以是協調一致的，也有可能是衝突的。如果兩者是衝突的，縱然其「位置」未必受到侵略，行動者的安全感也會陷入危機，而有強大驅力企圖使之復歸協調穩定。追求「身分」的穩定協調，體現了行動者的「本體安全」(ontological security)需求。¹⁰而這一「身分」需求，往往又與國家行動者的統治正當性(legitimacy)有關。也就是說，政權的主導意識型態同樣會限制國家對外「身分」的選項。一國的「身分」在國際間缺乏被認可的「資格」卻又難以調整，往往就是因為事涉統治正當性。

作者因此假定，同時考慮一個特定時空脈絡中，任何一個國家所處的「位置」與可能承擔的「身分」遺產，當可提供研究者詮釋、分析其外交史與政策軌跡重要的跡證。根據「身分」與「位置」的分析框架，1980年代以來，中共對美關係即經歷了以下類型歷程：聯合美國制衡蘇聯霸權的平衡者(1978-1982)、「獨立自主」傾向西方的平衡者(1982-1989)、「韜光養晦」尋求突圍的平衡者(1989-1992)、尋求「大國身分」的平衡者(1992-1996)、發展夥伴關係的負責者(1996-2001)、鞏固周邊的平衡者(2001-2002)、霸權下首極一負責的挑戰者(2002-2009)。¹¹

參、中共對美：「柔性制衡」的負責任挑戰者戰略

胡錦濤在第 11 次使節會議重申了「大國是關鍵、周邊是首要、發

¹⁰ 關於「本體安全」的概念，參閱 Brent J. Steele, *Ontological Securit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elf Identity and the IR State* (London: Routledge, 2008).

¹¹ 細節參閱張登及，〈外交戰略與國際地位〉，收於王振寰、湯京平、宋國誠編，《中國大陸暨兩岸關係研究》(臺北：巨流出版，2011年)，頁 422-451；Simon Teng-chi Chang, "China's Strategic Partnership Building: An Innovation or an Illus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39th Taiwan-U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temporary China*,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IR), Taipei, December 9-10, 2010.

展中國家是基礎、多邊是舞臺」的外交戰略指導。在此前後，中共無論是對美俄，或是與中亞、東協等國關係都有重大進展。即便是有釣魚臺問題，在後小泉時代的系列「中」日融冰舉措，加上「六方會談」(Six Party Talks)得分，並換取美國制約臺灣改變「身分」的企圖，也使東北亞與東亞局勢大為緩和。¹²易言之，中共在「位置」的兩方面：物質實力與地緣政治，以及「身分」的兩方面：認同與資格，都遠較 90 年代初與 911 事件時改善很多。似乎胡錦濤要求的「努力使中國在政治上更有影響力、經濟上更有競爭力、形象上更有親和力、道義上更有感召力」已經是可載入史冊的成就。

歐巴馬上任第 1 年，對華政策表現出冷靜與友善的態度，因此甚至被美方與臺灣部分人士誤以為是姑息外交。美軍曾與解放軍海軍發生諸如偵察船衝突與潛艦撞擊聲納儀事件，但雙方國防與外交部門表現高度克制。儘管歐巴馬上任後，美國總體仍維持其在世界權力體系的「霸主位置」，西方各國仍大體保有在國際建制與組織中的領導者地位。但中共亦可說是多少成功地渡過了一連串危機的考驗，站穩了體系中「霸主下首極」(First under the Hegemon)的「位置」。雙方都逐漸認清，美「中」關係的確是新世紀最重要的美國對外關係之一。這也是何以國務卿希拉蕊會用「同舟共濟」與「殊途同歸」等中國成語描述雙邊關係的原因。¹³實際上，希拉蕊在歐巴馬上臺前即於 2007 年 11 月的《外交事務季刊》(Foreign Affairs)撰文「21 世紀的安全與機遇 (Security and Opportunity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直言美「中」關係將是 21 世紀美國在全球最重要的一組雙邊關係，隱約印證了後來流行一時的「G2」論說。¹⁴

中共與美國主宰之現狀秩序間，仍存在許多「身分」與「位置」的矛盾。但彼此經貿關係相互依存的態勢不減反增，中共與美國乃至西方世界，也存在著廣泛的共同利益。新世紀以來，北京對美的外交戰略基

¹² Also see Teng-chi Chang, "Sino-American Geographical Competition in Northeast Asia after the Cold War: A Neorealist Perspective and its Reflection," *Journal of Northeast Asian History*, Vol.5-2, (2009), pp.171-211.

¹³ Hillary Rodham Clinton, "U.S. and Asia: Two Transatlantic and Transpacific Powers," Remarks at the Asia Society, see,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7333.htm>, accessed on April 22, 2009.

¹⁴ C. Fred Bergsten, "A Partnership of Equals: How Washington Should Respond to China's Economic Challenge," *Foreign Affairs*, Vol. 87-4, pp.57-69.

基本上是回應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前一時期對中國大陸的態度——「威脅性競爭者」(competitor)或「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responsible stakeholder)。而小布希與歐巴馬前期的對華政策，一方面鼓勵中方融入國際建制，促進其決策透明化，這是「國際社會化」(international socialization)戰略，意在用「資格」誘導中共改變「身分」規範。美國同時也要在亞太地區維持絕對軍事優勢，作為「位置」上避險(hedging)的工具。

相對的，中共則力圖鞏固周邊，在「上海合作組織」、「『中』非合作論壇」、「中國—東協(東協加一)峰會」機制、「『中』日韓三國峰會」機制、「金磚四國」等多邊舞臺，與「中」緬、「中」巴、「中」印等雙邊關係中，適時加碼。應對霸主，北京則將計就計，選擇性地加強制度化的磋商，例如升級「戰略與經濟對話」(Strategic and Economic Dialogue, S&ED)。這些「柔性制衡(soft balancing)」的措施，使得美國即便「重返亞洲」，也無法再訴諸新冷戰包圍中共。¹⁵與此同時，由於美國華爾街治理弊端引發全球金融危機，新自由主義與「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的全球「身分」論述正當性已經動搖。中共則繼 90 年代「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訴求後，又推出「和諧世界」口號，並藉由世界性的「中國熱」，推廣用儒家與孔子包裝的形象工程(如「孔子學院」)。在許多國際民調中，中共的形象一度領先美國而僅次於英、德。美國威望受挫，似乎使中共的「身分創新」漁翁得利。¹⁶

肆、歐巴馬「重返亞洲」的攻勢與中共外交的挫折

2009 年秋季，歐巴馬出席「亞太經合會」(Asia Pacific Economic

¹⁵ 朱鋒，〈中國和平崛起：與單極的關係〉，收於朱鋒與 Robert Ross 編，《中國崛起：理論與政策的視角》(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頁 50-54。各國對美「柔性制衡」的詳細論證，參閱 T. V. Paul, "Soft Balancing in the Age of US Prima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0-1(2005), pp. 46-71.

¹⁶ 統計資料可參閱王怡婷，《美國對中國崛起之認知分析 1992-2009》，政治大學外交系碩士論文，2011 年 6 月。中共發展軟權力對美造成的衝擊，參閱 Joseph Nye 及王緝思，〈中國軟實力的興起及其對美國的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2009 年第 6 期，頁 6-12。

Cooperation, APEC) 新加坡峰會並自許為「第一位太平洋總統」後，從 2010 年接見達賴、人民幣匯率等一系列事件，美「中」關係開始陷入低潮。2010 年 1 月希拉蕊訪問夏威夷的演說中曾提到美國已經重返亞洲，而且不會離開。¹⁷這句包含「美國重返亞洲」的名言，在當時似乎只引起「美國從未離開東亞」的嘲諷。外界對美國究竟如何「重返東亞」懷疑甚多。在 2010 年 3 月時，前中亞事務助卿范珍寶(Evan Feigenbaum) 還在《華盛頓季刊》(Washington Quarterly) 撰文〈美國為何不再瞭解亞洲？〉(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文中指出亞洲將不再是「亞太」，其秩序將從海洋轉向大陸。¹⁸然而美國領袖畢竟要受其霸主「身分」和內政正當性的制約，不可能選擇拋棄霸主「認同」。所以中國大陸崛起不僅在體系中構成了「基於能力的威脅」(balance of power)，也構成了「基於意圖的威脅」(balance of threat)。國力衰退的霸主從「新保守主義」(New Conservatism) 迷霧中走出，發現賓拉登畢竟只是「體系」中的漣漪，不是合格的無政府體系主要行動者。漸次脫除伊阿戰爭後，中共的挑戰者圖像就更為明顯。加上選舉壓力，美國世界霸主的正當性更要靠對「中」強硬，才能贏得國內選民的認同。只是這樣的攻勢性戰略調整，需要時機與事件配合。

2010 年 3 月發生的「天安艦事件」，戰略影響有如東亞版的「九一一事件」，提供歐巴馬靜觀 1 年後，實踐「重回東亞」政策很好的理由和著力點。當年 3 月和 5 月，希拉蕊與副卿史坦伯格(James Steinberg) 分別在與戴秉國和馬曉天會晤時聽到中共說「南海是中國核心利益」。此事經由日本媒體首先披露並由希拉蕊證實，更引起東協國家的關切。當年「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 期間，希拉蕊一席「南海自由航行是美國『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的談話，激怒了中共外長楊潔篪。但楊的強硬回話又火上加油，使部分東協國家更懷疑過去 10 年中共「睦鄰」、「負責」的背後究竟企圖為何。美國「重返東亞」，在「位置」與「身分」上都顯得師出有名。

¹⁷ “Remarks on Regional Architecture in Asia: Principles and Priorities,” Hillary Rodham Clinton, Department of State, January 12, 2010.

¹⁸ Evan Feigenbaum, “Why America No longer Gets Asia?”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34-2 (2011), pp. 25-43.

美國「重返亞洲」對中共周邊外交構成重大挑戰：第一，華府成功地加強美國在日的安保「位置」，阻止日本漂流，挫敗日本民主黨構思和中共認同的「東亞共同體」構想，並以將釣魚臺納入安保範圍對日提出保證。第二，加強美在韓的安保「位置」，重歸東北亞樞紐「身分」。這令經營「六方會談」多年的中共大大失分。中共一時被迫只能支持接班危機嚴重的金正日—金正恩政權，使北京自 2003 年以來經由六方會談取得的「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信用損耗極大。第三，加強東協與大洋洲各方對「東協模式」與中國大陸在其中經營已久的「負責者身分」的質疑。2010 年 ARF 會後，美國又有航艦首次訪問越南，舉行「慶祝美越建交 15 週年」軍演，同時簽署美越《民用核領域合作諒解備忘錄》。截至 2011 年底，不僅越日、越印有軍事交流，澳洲亦同意美國長期派遣 2,500 名陸戰隊員，甚至越緬兩軍也開始互動，菲律賓更是獲得美國軍售與美菲協防的鼓舞，對黃岩島等南海爭議更加強硬。美日介入大湄公河區域，支援寮國與柬埔寨的開發計畫也不容輕忽。¹⁹尤有甚者，美國正穩健改善與緬甸關係，並鼓勵歐盟國家加強投資緬甸，誘使緬甸減少對中共經援的依賴。去（2011）年底希拉蕊訪問緬甸，還被緬甸總統登盛（Thein Sein）描述為「美緬歷史新頁」。²⁰根據中國大陸學者金燦榮的分析，蘇哈托、馬哈蒂、塔信等強人之後，東協已無有雄心的領袖，印馬、星馬、泰柬的衝突已經使「東協模式」名存實亡。²¹第四，建立經濟圍堵，反制中共「東協加一」自由貿易區。美國自去年末起，果決與韓國簽訂韓美自由貿易協定（free trade agreement, FTA），特別是歐巴馬在夏威夷與峇里島出席 2011 年「亞太經合會」和「東亞峰會」（East Asia Summit），遊說日本、澳洲與東協各國參加「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這項作為雖然非一蹴可幾，但已有動搖「東亞區域整合以東協／東協加三為中心」的趨勢，重新使美國成為東亞區域整合的核心，大有將以「國企」為主的中國大陸貿易大軍

¹⁹ 〈中國外交出現微妙調整〉，《紫荊雜誌網路版》，2012 年 4 月 26 日，<http://www.bamag.com.hk/big5/channel3/0909/0935.html>，檢索日期 2012 年 4 月 29 日。

²⁰ “Clinton Pledges Improved Burma Ties as Reforms Continue,” BBC, December 1, 2011,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5978893>, accessed on March 12, 2012.

²¹ 金燦榮，〈小心亞洲世紀變成亞洲悲劇〉，《環球時報》，2011 年 11 月 29 日。

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

逐出東亞、擊破「東協加一」隊形的氣勢。²²一言以蔽之，「天安艦事件」與「南海重要利益風波」是美國「重返亞洲戰略」的轉捩點，並造成中共周邊睦鄰外交近 15 年（自 1997 亞洲金融風暴）來「身分」與「位置」上最嚴重的損失。

如同紐約時報去年 11 月 16 日所下的標題：〈美國放眼亞洲，所見全是中國大陸！〉（As US Looks Toward Asia, It Sees China Everywhere!），「中國大陸」是「重返亞洲」言外無所不在的幽靈。²³所以美國「重返亞洲」還不僅著墨亞洲，還有全球性兩大戰略佈局配套：退出中東，與美俄關係調整。包括美國積極營造伊阿局勢穩定的印象，以圖根本減輕小布希以來，在中東承受的沈重戰略負擔（從 2003 年迄今，伊戰已經耗費美國 8 千億美元，約合 24 兆臺幣）。美國正規軍已在去年底全部撤出伊拉克，現在發生焚經與士兵濫殺事件，正好加速將絕大部分單位撤出阿富汗。其次，積極改善與俄國梅德維杰夫（Dmitry Medvedev）政權的關係。美國將俄國拉入「東亞峰會」，使其涉足「中國大陸崛起」的後院，中共啞巴吃黃連，只能歡迎。

如果前述初步觀察大致不差，則顯示歐巴馬政府執政初期對中共的「戰略再保證」（strategic reassurance），是為了爭取戰略修整時間。從理論角度來看，立足地緣圍堵的「攻勢現實主義」正在取代「避險」，成為美國對「中」的優勢戰略，目的就是削弱中共「位置」持續強化的勢頭，逼迫中共無法在「挑戰者」與「負責者」的「身分」之間取巧，要周邊與發展中國家「認識」中共的「表裡不一」。如同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王緝思的分析，美國的攻勢使美「中」兩強「合作空間將

²² 許多觀察家都不諱言，TPP 旨在從經濟上反制「東協加一」並組建對「中」經濟圍堵。例見英國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所（IISS）」研究：Sanjaya Baru, “America’s New ‘Pacific Offensive’ – A Strategy To Contain China,” November 17, 2011, <http://www.economywatch.com/economy-business-and-finance-news/americas-new-pacific-offensive-a-strategy-to-contain-china.17-11.html>,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2。美方負責「亞太經合會（APEC）」的資深官員特別澄清 TPP 不是圍堵中國大陸，參閱 “US Officials Say Asia Partnership Does Not Contain China’s Rise,” *China Daily*, February 23, 2012, http://www.chinadaily.com.cn/usa/epaper/2012-02/23/content_14677276.htm, accessed on March 16, 2012.

²³ “As US Looks Toward Asia, It Sees China Everywhere!” *Th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2011.

受到擠壓，重大較量將難以避免。」²⁴所以儘管習近平訪美受到隆重禮遇，兩國關係的實質現階段已是「互信稀缺的互賴」，危機與損害管控，遠多於協調合作。²⁵

伍、當前中共對美戰略的困局：「位置」與「身分」的逆行

如同王逸舟、時殷弘、王緝思、朱鋒等評估所綜合顯示，這幾年中國大陸社會的國際觀產生了「財大氣粗、咄咄逼人的虛矯之氣」，「盛世情懷太重」，甚至知識界與外事機構都忘卻謙虛睦鄰，「滿腦子突破封鎖與拔釘子的計算」。²⁶軍方與「新左派」的發言有時也神來一筆，「在在預示危險轉捩點的逼近」。中共無法提供國際社會「身分」話語的公共財，卻忙著用提升的軍力保衛增長與擴大的「位置」利益（例如遠洋資源取得、能源運輸線防衛的部署），這樣「身分」可疑的中國大陸，開始使亞洲及部分發展中國家恐懼，認為中共作風有「新殖民主義」的影子。根據朱鋒與王逸舟的觀察，美國已經重新在中國大陸四周（或許除了中亞）贏得主動，且中共內部對此還茫無頭緒，並無有系統的應對策略出臺。筆者認為，癥結就在於中共國力與「位置」的上升，正與「身分」定位發生逆行現象。「身分」缺位造成「位置」的優越，找不到相適應的國際「認同」與「資格」。以往經營的「負責者」又向現實主義的「制衡者」與修正主義的「挑戰者」形象倒退。「位置」與「身分」兩者的不協調在美國攻勢下暴露，領導層與學界又忙於「十八大」交接，要使兩者重新恢復協調也是有心無力。

也因如此，去年5月中共接待緬甸總統登盛來訪時，急著將「中」緬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合作夥伴」；7月中共在峇里島趕忙與東協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指針》；10月接待越共總書記阮富仲（Nguyen Phu Trong）時又簽署「『中』越聯合聲明」，推動「『中』越全面戰略合作夥

²⁴ 王緝思，〈「中」美重大戰略較量難以避免〉，《新華網》，2010年8月5日。

²⁵ 習近平訪美的分析，參閱 Simon T. Chang, “Xi Jinping’s Visit to the US: A New Start to an Uneasy Sino-U.S. Relationship?” *Prospect Foundation Newsletter*, Issue 3, 2012, <http://www.pf.org.tw/>，檢索日期 2012 年 3 月 10 日。

²⁶ 王逸舟原文可見中國評論新聞，2010年12月25日，<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檢索日期 2011 年 12 月 4 日。

伴」，同意開通「中」越領導人與漁業部熱線，簽署「關於指導『中』越海上問題基本原則協議」，要求越南「保持冷靜和克制，不讓任何敵對勢力破壞兩黨、兩國關係」。凡此種種都只是戰術上的退卻，試圖固守地緣「位置」的影響力（勢力範圍），但明確的戰略指針尚未明顯浮現。

其實中共受「身分」與「位置」逆行問題困擾由來已久，只是美國當時身陷伊阿戰爭，中共外交戰略的缺損不容易暴露。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簡稱國新辦）曾在 2005 年 12 月 22 日發布了《中國的和平發展道路》白皮書，時隔近 6 年，去年 9 月 6 日中共國新辦再度發表《中國的和平發展》白皮書，內容頗受重視，並由「高層」親自修改，就是企圖用論述將「位置」的優化與「身分」的不確定重新統一起來。兩版以「和平發展」為名的白皮書，其共同點都是在強調北京選擇「和平發展」國策的三個必然性：邏輯（理性選擇）、歷史必然，以及道德必然。去年版本有兩項相互關連的不同點：明顯更加強調中華文化與文明要素（參閱附表），以及中華文化與文明是使中共選擇「和平發展」的第一因素。去年白皮書的以下論證，顯示中華文化已成為和平發展戰略論述的首要因素，這與中共建政以來黨政各項報告、聯合聲明和白皮書相較，確實是前所未有，更是文革時期內外都要「鬥批改」所不可想像的：

中國基於自己幾千年歷史文化傳統，基於對經濟全球化本質的認識，對 21 世紀國際關係和國際安全格局變化的認識，對人類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的認識，鄭重選擇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作為實現國家現代化、參與國際事務和處理國際關係的基本途徑。幾十年來的實踐證明，中國走和平發展道路走對了，沒有任何理由加以改變。

附表：2005 年與 2010 年和平發展白皮書結構及中華文化詞彙頻率表

	2005 版	2011 版
第一章（含前言）	一、和平發展是中國現代化建設的必由之路（2）	一、中國和平發展道路的開闢（2）
第二章	二、以自身的發展促進世界的和平與發展（0）	二、中國和平發展的總體目標（0）
第三章	三、依靠自身力量和改革創新實現發展（0）	三、中國和平發展的對外方針政策（0）
第四章	四、實現與各國的互利共贏和共同發展（0）	四、中國和平發展是歷史的必然選擇（6）
第五章	五、建設持久和平與共同繁榮的和諧世界（1）	五、中國和平發展的世界意義（2）
提及「和諧世界」（含「和諧亞洲」及「和諧整體」）次數	11	9
提及中華文化與文明次數	3	10

*括號內數字係該章節提及中華傳統文化、歷史與文明之次數（作者整理製作）

「和」的概念是中共外交與對美「身分」戰略的支柱。但從中共外交史的發展歷程可知，實際上「和平共處」是服務於冷戰中對第三世界的爭奪。「和平發展」是用來爭取已開發國家對「改革開放」的支持。「和平崛起」是中共國力上升前期用以駁斥「威脅論」的話術。但隨著阿伊戰爭與兩次金融危機造成美歐力量的削弱，使中共影響力相對顯得增強，「前三和」（和平共處、和平崛起、和平發展）已無法滿足中共重新定位「身分」的需要——（1）無法說服西方與周邊國家相信，中國大陸絕不重複近代世界史「國強必霸」的規律；（2）無法指引本國公眾與外交人員在本國實力上升時，保持冷靜平和，抑制民族主義亢奮。

「前三和」的蒼白乏力，自然使大陸各界回頭找尋超越近代世界史

(即西伐利亞體系史)的啟發。與此同時，中共執政正當性的官方教條——馬列毛社會主義——支撐政權的效力也快速退去。以當代世界社會主義、馬列思想繼承人自居，此一「身分」顯然不再能感動世人，甚至可能帶有激起基層群眾批判貧富不均的危險暗示。中共於是將馬列束之高閣，從傳統與歷史的宗廟請出中華文化與孫中山先生，不僅作為新的國際名片，也有助於統治的正當性並開展「管理創新」。

中共與中國大陸各界顯然注意到，僅是持續推銷 80 年代以來帶有階級革命與「左」的色彩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雖然可以與「華盛頓共識」對抗於一時，卻不能贏得已開發國家與周邊國家可持續的尊重，反而有被扣上「修正主義」挑戰者標籤的危險。另一個中共堅持已久的「身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主要的「身分」規範——和平共處五原則的「不干涉主義」也在利比亞與敘利亞危機中日益貧瘠化。深入研究可以發現，實際上中共早已廣泛參與各種維和與干涉行動。²⁷今年起更首次向南蘇丹派遣重型武裝執行維和。早前北韓金正恩（Kim Jong Eun）再度試射「衛星」，中共也接連表示關切。於是從傳統文化與歷史經驗著手，企圖找尋新的「軟權力資源」來支持「和諧世界」論述，是重新界定「身分」以適應新超強「位置」的重要出路了。

然而，中共欲從中華文化找尋「身分」定位，說服美國與國際社會相信它貢獻「和諧世界」與美「中」合作的誠意，一如 2011 年 2 月「紅旗文稿」刊載中共中央外聯部孫根紅〈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及我國的應對策略〉一文所指，中共還要面對十項矛盾的挑戰。²⁸此文未提及的第十項，也是最關鍵的矛盾，自是社會主義正當性弱化下，無信用的舊話語與建構中的中華文化價值新動力間的根本矛盾。「中國模式」及「中國道路」若不能化解此一根本矛盾，則聲稱植根於「傳統文化」的「和諧世界」，難以有超越「摸著石頭過河」的境界，從而使霸主與周邊鄰邦心悅誠服，自然也難阻止其他國家響應美國的圍堵攻勢。

²⁷ 例見 Allen Carlson, "More Than Just Saying No: China's Evolving Approach to Sovereignty and Intervention since Tiananmen," 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S. Ross ed.,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ies of Chinese Foreign Polic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217-241.

²⁸ 孫根紅，〈國際政治格局的新變化及我國的應對策略〉，《紅旗文稿》，<http://theory.people.com.cn/GB/13917561.html>，檢索日期 2012 年 2 月 24 日。

陸、結論

美國維繫全球霸主「身分」與「位置」的決心是確定的，但以何種方式成本較小則是有選擇的。中共「位置」上升雖是不爭事實，但北京尚無相應的全球「身分」戰略，對未來國際秩序想像也沒有定型，內部各類爭辯甚多。其外交關鍵不是如何改善「位置」，但「身分」創新將暫時難產。此時美國要拉攏盟邦，但並不放棄形塑中共戰略發展的可能，使中共的「位置」與「身分」被限制在有利於美國主導的秩序之內。

如同歐巴馬所言，認為美「中」競爭只能導致直接、硬性的敵對（adversary）尚言之過早。相反地，如同美國國防部長潘內塔（Leon Panetta）於去年 11 月 29 日在《金融時報》撰文提到，美國在東亞追求的是「廣泛、持久、靈活」的存在。這與小布希後所宣示的「戰略彈性（strategic flexibility）」和希拉蕊近來提出的外交「前進部署（forward deployed diplomacy）」仍屬一致，亦即重申領導地位與軍事存在，但也要求「盟友」承擔制衡崛起者的責任，而非使美國防衛力量大量暴露於威脅的第一線，這些作法也符合攻勢現實主義有作為、有卸責的特徵。

同時，美國的「重返亞洲」對東亞國家或許是一激勵。但美國是否能順利從中東脫身，變化中的全球伊斯蘭世界究竟是轉向有利美國或其他勢力？美俄關係在普欽接手俄國執政後是否仍和緩友好？凡此都將制約美國真正能投注多少資源在亞洲。不僅美國的東亞戰略將需要很長時間的部署，中共的外交籌碼也並非在減少中。因此，可以先行預判，到「十八大」之前，除非爆發領土爭端問題的惡性事件（例如爭議海域與領土上有傷亡的衝突），中共將以守勢回應美國的亞洲攻勢。尤其對東協國家，可能出現較為溫和的姿態。例如：南海問題作出戰術性讓步（同意航行與開發問題可多邊化，唯主權爭議仍屬雙邊等）；在「東協加一」的框架中給予東南亞國家更多貿易優惠條件；降低、延後海軍在南海活動的能見度，代以海監、漁政單位等的巡航（然東海與西太平洋方面共軍卻有可能維持活躍）。但「十八大」之後，如何克服「身分」與「位置」逆行的外交難題，將是習進平時期對外戰略的根本性挑戰。

（本文為作者個人意見，不代表本部政策立場）

中共對美「重返亞洲」戰略的回應趨勢與展望